

# 体认语言学观照下隐喻映射的“多源性”研究

——基于“愁”的概念隐喻分析

黄兴运 谢世坚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作为中国本土化语言理论的一种创新,体认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对语言的成因具有较强解释力。基于“愁”的概念隐喻,本文以体认语言学为观照,从体认者的认知主体性、始源域特征投射的选择性和目标域特征的多样性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了隐喻映射“多源性”的发生理据。研究表明:(1)隐喻是体认者的一种心理映射,反映其对某一特定事物体验认知的心路历程;(2)隐喻映射是体认者在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进行特征选择与聚焦的认知加工过程;(3)体认者的认知主体性、始源域特征投射的选择性以及目标域特征的多样性共同促进相应概念隐喻映射“多源性”的产生。

**关键词:**体认语言学;认知主体性;隐喻映射;多源性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2)03-0089-09

## 0 引言

认知语言学(CL)虽已成为当今国内外的主流学派,但其名称的“认知”二字却名不副实,未能体现这一学科的理论取向。有鉴于此,王寅教授及其团队经过20多年的研究和思考,主张将认知语言学修正为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ECL),以彰显其体验性和实践性。王寅认为,人类的心智和语言都源于对现实的“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2014:61),其概念形成遵循着“现实—认知—语言”的进展程序。体认语言学的提出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了一系列较有意义的研究(王寅,2014/2020/2021;赵永峰,2019;张克定,2019;刘云飞,2019;王寅等,2019;帖伊等,2019;刘玉梅等,2020;牛保义,2021)。本文通过系统考察“愁”概念隐喻映射“多源性”的发生理据,以具体的语言实例进一步揭示体认语言学的解释力。

## 1 隐喻的“多源性”及相关研究

隐喻具有多源性特征,同一喻体与不同的本体相结合可以产生不同的意义,即所谓的“比喻之两柄”现象,“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喻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同而旨则异”(钱钟书,1986:39-40)。换言之,隐喻映射具有“多元性”,即一个始源域可以映射到多个目标域,如“人生如棋”“经营如棋”“战争如棋”等表达都是以“棋”为始源域;从另一角度来看,一个目标域也可以通过多个始源域来理解,如“爱是花蜜”“爱是旅途”“爱是战争”等表达,其目标域“爱”分别取源于

收稿日期:2021-1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戏剧修辞比较研究”(19BY09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兴运,男,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

谢世坚,男,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莎士比亚语言与翻译研究。

引用格式:黄兴运,谢世坚.体认语言学观照下隐喻映射的“多源性”研究——基于“愁”的概念隐喻分析[J].外国语文,2022(3):89-97.

“花蜜”“旅途”和“战争”，从而造成隐喻映射的“多源性”。

对于隐喻映射的“多源性”，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一些较有意义的研究，如佐尔坦·科维奇(Zoltán Kövecses, 2002/2010)在论述始源域和目标域的映射关系时提到“一个目标域需要多个始源域的映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为此展开分析；特里·詹森(Terry Janzen, 2004)在探讨美国手势语时提到“施喻者”视角的转变导致了隐喻映射的“多源”产生，但也没有深入探讨其背后的理据；王文斌等(2003)在分析“隐喻的始源之源”时提及了“始源的多元性”，但也没有展开讨论；王文斌(2007a)在论述“隐喻的认知建构与解读”时提出，不同的施喻者对同一个认知对象会合成出相同的隐喻，即“同隐喻性”，不同的施喻者对同一个认知对象也会合成出不同的隐喻，即“异隐喻性”。本质上，“同隐喻性”“异隐喻性”与隐喻“多源性”的发生理据具有一致性，但王文斌的重点在于运用“概念合成”理论来探讨隐喻建构与解读中的主体认知原则和认知运作机制，对“同隐喻性”和“异隐喻性”现象的分析着墨不多。体认语言学认为，“体认性渗透到语言的各个层面，处处皆有体现”(王寅, 2019: 23)，隐喻表达也不例外。隐喻构建因人而异，因物而异，具有显著的“体认性”。鉴于国内外学者在论及隐喻映射时鲜有涉及这一特性，覃修桂等(2014)曾从认知主体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及感官差异性”作了相关论述。本文则以体认语言学为观照，以“愁”的概念为例，进一步从“体认者的认知主体性”“始源域特征投射的选择性”以及“目标域特征的多样性”三个方面，系统分析隐喻映射的“多源性”特征，试图全面揭示其背后的认知理据以及体认语言学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 2 隐喻映射的“多源性”表现

隐喻是人类的基本认知机制。借助隐喻，人们能够通过一种经验来理解和认识另一种经验，从而建立起概念系统，这正如雷柯夫等(Lakoff et al., 1980: 3)所说“人类语言是隐喻性的，左右了我们的思维，也影响了我们的行为方式。”换言之，人类的语言世界是一个隐喻的世界，人的绝大部分思维都是隐喻性思维。通过隐喻映射，生活中诸多抽象概念可以更为通俗易懂地为人们所理解，如情感概念中的“愁”就可以通过其他相关事物特征的映射来加以认知，如：

### (1) 始源域：江草

目标域：愁

隐喻映射：愁是江草

#### 1) 江草日日唤愁生，巫峡泠泠非世情。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

十年戎马暗万国，异域宾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见否，人经罢病虎纵横。(杜甫《愁》)

这里，杜甫取源“江草”来喻“愁”，借助江草的寒瑟来阐释自己一生颠沛流离的愁绪。以“江草”为喻体来进行映射，杜甫的“愁”便得到形象的表述。

### (2) 始源域：落花

目标域：愁

隐喻映射：愁是落花

#### 2)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一剪梅》)

此处，李清照取源“落花”来喻“愁”，通过花的飘零来表达自己因思念远方亲人而产生的愁伤。以“落花”为喻体来进行映射，李清照的“愁”便得到生动的突显。

### (3) 始源域：烟草、风絮、梅子雨

目标域: 愁

隐喻映射: 愁是烟草, 是风絮, 是梅子雨

3) 凌波不过横塘路, 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 月桥花院, 琐窗朱户, 只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蘅皋暮, 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 一川烟草, 满城风絮, 梅子黄时雨。

(贺铸 《青玉案》)

此处, 贺铸取源“烟草”“风絮”和“梅子雨”来喻“愁”, 通过“烟草”连天、“风絮”飞舞、“梅雨”连绵来映衬自己偶见佳人却无缘相遇的无尽惆怅。以“烟草”“风絮”和“梅子雨”为喻体来进行映射, 贺铸的“愁”便得到传神的体现。

同是一个概念“愁”, 为何在不同诗人眼里, 既可以是“江草”, 也可以是“落花”, 还可以是“烟草”“风絮”和“梅子雨”? 为何隐喻映射可以如此“多源”? 以体认语言学观之, 一切皆因“语言是‘人之所为, 惟人参之’的结果”(王寅, 2014: 62)。体认语言学强调“人本观”和“唯物观”, 倡导从“人本”和“唯物”两个方面来分析语言的成因。沿着这样的思路, 以下从“体认者的认知主体性”“始源域特征投射的选择性”以及“目标域特征的多样性”三个维度来探讨隐喻映射“多源性”的发生理据。

### 3 隐喻映射“多源性”的体认分析

#### 3.1 体认者的认知主体性

人是世界万物的认知主体, “语言与世界同构”(王寅, 2019: 19)。万事万物, 不管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 都需要通过人的体认, 然后上升为语言, 最后才得到形象的表达, 这便是“人本观”的体现, “人们构建隐喻, 多半是便于表达自己对目标概念的阐述, 是自己认知的一种心理投射”(王文斌等, 2003: 9)。任何隐喻的产生都隐含着体认者对某一特定事物的特殊认知。隐喻映射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 原因就在于作为构建隐喻的不同体认者能从各自独有的视角来体验世界和认知世界。体认者具有认知上的主体性, 正所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在具体的隐喻建构过程中, 体认者的认知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不同的体认者因其个人的知识和经历的不同, 对同一个目标域, 会选择不同的始源域来进行特征映射; 其二, 即使是同一体认者面对同一目标域, 也会因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而选择不同的始源域来进行特征映射。本文所考察的“愁”的隐喻映射之所以表现出“多源性”, 原因就在于体认者的认知主体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下结合三位诗人的独特体验来分析第一种情况, 即对于同一目标域, 因认知主体不同而选择了不同的始源域来进行特征映射。

##### (1) 杜甫的“愁”与“江草”

草具有“思乡离情”的意象, 如“王孙游兮不归, 春草生兮萋萋”, 也有“萧瑟荒凉”象征, 如“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杜甫此诗的“江草”, 是“思乡离情”与“萧瑟荒凉”兼而有之。此诗写作时, 正值安史之乱, 全国各地民生凋敝。羁旅夔州的杜甫有家难回, 望着江涛汹涌, 江草萧瑟, 无限愁绪, 涌上心头。自己的命运, 国人的命运, 正如这江边之草, 风来被虐, 水来被淹, 流离颠沛, 让人悲愁不已。因此, 基于如此体验, 杜甫取源“江草”来映射, 其悲凉之“愁”更让人动容。

##### (2) 李清照的“愁”与“落花”

花具有“美”的象征, 花开悦目, 花落伤感。“美人迟暮”, 花落意味着美的逝去。李清照出身名门, 18岁与时年21岁的太学生赵明诚在汴京成婚。不过, 婚后李清照夫妇聚少离多, 生活并不十分如意。李清

照长期独居,就如花儿静静地独自开放又默默地独自飘落,其中的滋味如此凄愁,唯有落花才能更好地体现。因此,基于如此认知,李清照取源“落花”来映射,其孤情之“愁”更令人感慨。

### (3) 贺铸的“愁”与“烟草”“风絮”和“梅子雨”

佳人常会让人动情。贺铸长期隐居,埋头书海。某日潜心写词,偶然抬头间,只见远处佳人姗姗而来,这是何等让人春潮涌动。诗人满怀期许佳人走近,能够四目相对,可佳人却“凌波不过横塘”。此情此景,诗人只能“但目送、芳尘去”,提起“彩笔新题断肠句”。贺铸正是基于此种情形,写下《青玉案》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千般无奈,万般愁绪。可见,贺铸取源“烟草”“风絮”和“梅子雨”来映射,其萌情之“愁”更使人无奈。

以上三位诗人,经历各殊,体验有别,对“愁”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选择不同的始源概念来映射自己的愁绪。体认语言学认为,从根本意义上说,心智基于体验,思维基于体验,意义也基于体验,“语言是人们在对外观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王寅,2017:2)。由于人们经历各异,体验世界方式不同,因而对世界的认知也会不尽相同。这种不同的认知反映到隐喻的建构上,便产生了面对相同的目标概念却选取不同的喻体来进行映射,从而使得隐喻映射具有“多源性”特征。

下面以著名诗人李煜在《相见欢》和《虞美人》中所表达的“愁”来阐明第二种隐喻映射情况,即认知主体相同,目标域相同,但始源域选择却不同:

#### (4) 始源域: 丝麻

目标域: 愁

隐喻映射: 愁是丝麻

#### 4)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李煜 《相见欢》)

#### (5) 始源域: 春水

目标域: 愁

隐喻映射: 愁是春水

#### 5)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 《虞美人》)

在《相见欢》中,李煜将“愁”喻为“丝麻”,而在《虞美人》中却把“愁”喻为“春水”。同是愁绪,为何李煜也会取源参照不同?

《相见欢》是李煜的哀叹诗,描写的是其亡国被囚时,登楼的所见所感。开宝八年(975年),宋朝灭南唐,李煜败国亡家,被囚于汴京。曾经风光无限的国君,沦为任人欺凌的囚徒,身份的转变使李煜百感交集。李煜形单影只,“无言独上西楼”,抬头“月如钩”,低头“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不免悲从中来。如钩的残月经历了的阴晴圆缺,也见证了李煜的悲欢离合;深锁院中的梧桐,受尽秋风摧残,枝残叶败,不正是李煜的缩影。“落魄孤寂、思乡凄怆”,各种愁绪郁结于心,正如一团无端无绪的丝麻,难理难清,“别是一番滋味”。基于此,李煜取源“丝麻”来映射,更好地体现其彼时之愁的杂乱无序,悲郁难解。

《虞美人》是李煜的血泪歌,描写的是其亡国后顿感生命落空的悲愁。“春花秋月”勾起了李煜对昔日歌舞声色的回忆。“小楼东风”“故国不堪回首”突显南唐王朝的破灭,李氏社稷不再。若要回首,万般凄楚。“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故都华丽的宫殿大概还在,但往日宫中的红粉佳人却朱颜已改,一切美好不复存在。大好的江山社稷,缘何国土更姓,山河变色?只因李煜往日纵情声色,不理朝政,枉

杀谏臣。回想往日的所作所为,李煜顿悟自己是何等荒谬愚昧。深感离国之辱、被囚之悔、亡国之恨的李煜,悲郁幽愤,愁绪万千。因此,李煜取源“春水”来映射,更好地凸显其绵绵悲愁如滔滔江水,流之不尽,悔恨终身。

简言之,在《相见欢》中,李煜的愁是一种思乡的哀叹,而在《虞美人》中,李煜的愁则是一种亡国的悔恨。体验不同,思想认识不同,隐喻构建的取源也就不同。因此,同是李煜,同是愁绪,其隐喻映射便有了“丝麻”与“春水”的多源之别。

通过以上四位诗人对“愁”的不同表达可以看出,认知主体及其体验经历在隐喻意义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的生活体验及对事物观察的视角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表达,形成了人们的一种基本的认知能力”(束定芳,2016:3)。简言之,体认者构建隐喻常常是出于表达自己各种思想的内在需要,“出于内而发乎于外,借助客观事物的内外在联系来构建隐喻,阐发自己的内心观照”(王文斌,2007b:5)。正因如此,隐喻映射具有“多源性”也就顺理成章了。

体认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们在与现实世界体验互动和认知加工过程中形成的,强调只有在人的‘认知’作用下,‘语言’才可能与‘现实’发生联系,充分彰显了体认性人本精神”(王寅,2019:20)。以上探讨“体认者的认知主体性”对隐喻映射“多源性”产生的影响便是“人本观”的人本精神体现。除了受“体认者的认知主体性”的影响,隐喻映射的“多源性”也受“始源域特征投射的选择性”的制约。“始源域特征投射的选择性”既反映出体认者建构隐喻的“人本观”,也体现出“唯物观”。以下从这一方面进一步阐述隐喻映射“多源性”发生的第二种理据。

### 3.2 始源域特征投射的选择性

雷柯夫等(1980:13)认为,“隐喻只是部分地建构我们的日常概念”,所以概念的隐喻结构必定是局部的,而且大多数概念都是借用其他概念得到局部的理解。因此,在隐喻的建构过程中,体认者对始源域投射的特征进行选择与抑制是必然的,需要通过“特征聚焦”来解决(Kövecses,2002/2010)。所谓“特征聚焦”是指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特征投射过程中,始源域和目标域都只“强调”某一方面的特征,其他方面的特征则被“抑制”了。“强调的”是体认者想要表达的特征,而“抑制的”则是体认者不需要的。通过强调与抑制,体认者最终实现其理想的隐喻表达,如:

#### (6) 始源域: 烟缕

目标域: 愁

隐喻映射: 愁是烟缕

#### 6) 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

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王雱 《眼儿媚》)

#### (7) 始源域: 白发

目标域: 愁

隐喻映射: 愁是白发

#### 7) 早白发,缘愁万缕。惊飙从卷乌纱去。

漫细将,茱萸看,但约明年,翠微高处。(吴文英 《霜叶飞·重九》)

在例6)中,第一句为隐喻表达,体认者王雱取源“烟缕”来映射“愁”。作为始源域,“烟缕”具有多种特性,如“轻盈”“朦胧”“惹人思乡”等。根据语境可知,王雱想表达的是“愁如烟缕,惹人思乡”。显然,在“烟缕”的各种特性中,只有最后一个特征“惹人思乡”被“聚焦”投射到目标域“愁”之上,其余的特征

因为不符合始源域与目标域的特征协调,都在“特征聚焦”的作用下被抑制了。在例7)中,第一句也是隐喻表达,体认者吴文英以“白发”喻“愁”,表达对衰老的无奈感伤。“白发”具有“细小”“让人感伤”等多种特性,但此处吴文英仅聚焦于白发“让人感伤”这一特性,从而深刻地表达出“白发”生“愁”的无奈感伤。

换言之,隐喻投射“不是全部的、随意的,而是部分的、有选择性的”(刘正光,2003:8),因为隐喻基于相似性,本体和喻体之间是不可能全等的。因此,体认者只有通过特征的选择,才能在始源域和目标域中找到恰当的聚焦点,实现形象的隐喻映射。简言之,在隐喻建构过程中,体认者进行始源域的特征选择与抑制是“人本观”的体现,而始源域具有一定的特征可供选择,这是“唯物观”的体现。以体认语言学释之,“体认者在体认现实、表达现实的过程中虽然具有主体性作用,但作为客体的现实也会反作用于体认者,对体认者的体认和理解表达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张克定,2019:77)。因此,在主客互动的“特征聚焦”过程中,“始源域特征投射的选择性”对隐喻映射“多源性”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

### 3.3 目标域特征的多样性

任何事物都是集多种特性于一身的,因此,单一始源域不足以理解一个目标域,需要多个始源域的映射来对其进行全面的认知(Lakoff et al.,1999; Kövecses,2002/2010/2020)。下面结合“愁”的概念,以“目标域特征的多样性”为隐喻映射“多源性”发生的第三种理据作进一步的分析。

“愁”为何物?《说文解字》对其解释为“愁,从心,秋声”,《现代汉语辞海》对其释义为“忧虑”,这都说明“愁”是人的内心世界里既看不见也摸不着甚至难以表达的感觉,因此人们常感慨“世间无数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既然“愁”是一种抽象的、难以把握的情感,人们又如何去认知“愁”?唯有借助隐喻,通过其他相关事物的特征映射来加以认知,因为“大千世界中的万物是统一的,也是相互联系的,人们因此将储存于记忆中的诸事物的特征与眼前看到或正在思考的事物的特征联系起来”(王文斌,2007b:7)，“相异但是同一的东西正是构成隐喻的本体和喻体二物的基本特征”(徐盛桓,2014:366)，“隐喻能让抽象的概念通过具体概念的特征投射获得意义”(Kövecses,2017:328)。

在日常生活里,“愁”无处不在,无人不有。以上探讨了杜甫的“愁”是“江草”,李清照的“愁”是“落花”,贺铸的“愁”是“烟草”“风絮”和“梅子雨”,李煜的“愁”是“丝麻”与“春水”,这仅是“愁”的部分特征的体现。除了以上特征,“愁”还有其他特性让人感受颇深,因此语言中还存在诸多取源不同的“愁”隐喻,如:

(8) 始源域: 云

目标域: 愁

隐喻映射: 愁是云

8)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 《登金陵凤凰台》)

9)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岑参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太阳是光明与希望的象征,看到太阳就看到了光明与希望。不过,云能蔽日,一旦风卷云起,遮天蔽日,到处茫茫一片,光明便难寻踪迹。愁也是如此,每当愁绪来袭,人的内心也是迷蒙一片,正如浮云蔽日般,看不到光明与希望。基于如此体验,人们便以云喻愁,出现了“愁是云”的隐喻映射。

(9) 始源域: 山

目标域: 愁

隐喻映射: 愁是山

10) 穷愁重如山,终年压人头。(李群玉 《雨夜呈长官》)

11) 春愁离恨重于山,不信马儿驮得动。(石孝友 《木兰花·寻春误入桃源洞》)

山有重量,推之不动,愁有分量,压人心头。每当忧愁降临,人的心情便随之沉重。愁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其“沉重”何以表达?基于独特的认知,诗人通过山之“重”来映射,愁之“重”便得以形象具体化。愁“重”如山,愁“重”于山,以山喻愁,语言中又有了“愁是山”的隐喻映射。

体认语言学认为,“人类对现实生活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不仅决定话语内容,而且决定语言表达方式”(王寅等,2019:45)。因此,隐喻的多源映射揭示了“世界事物的存在不是随机的,事物间会有同一性范型,常会表现出多样的统一”(徐盛桓,2014:368)。以上分析表明,愁“迷蒙”,愁“沉重”,愁给人带来的这些切身感受都需要用语言来表达,而现实中没有任何一样事物同时具备这些特征。因此,多源取喻来建构隐喻便成为全面描述愁的必然选择。概言之,现实中“目标域特征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隐喻映射的“多源性”发生,这便是体认语言学“唯物观”的深刻体现。

#### 4 隐喻映射“多源性”发生机制

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现象,更是概念之间的映射,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体认反映。换言之,任何概念的隐喻表达均以人的体认为基础,遵循着“现实—认知—语言”的进展程序,愁的概念也是如此。基于以上分析,以下把“愁”概念隐喻在“体认者的认知主体性”“始源域特征投射的选择性”以及“目标域特征的多样性”三个维度作用下产生的“多源性”发生机制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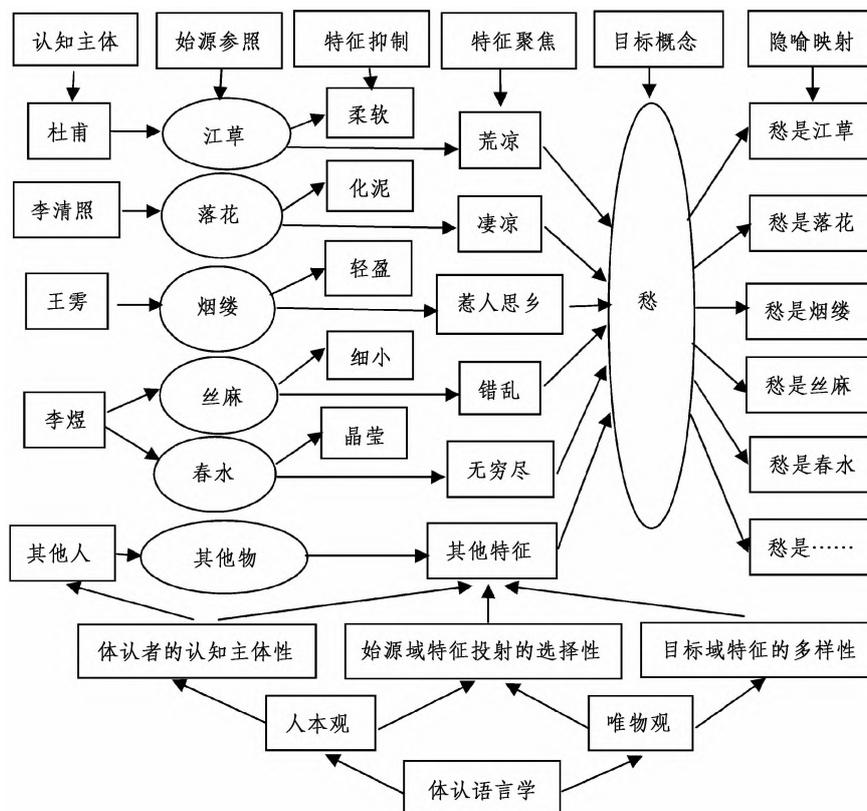


图1 “愁”概念隐喻映射“多源性”的发生机制

体认既“凸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强调了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论立场”(张克定,2019:76),因此,以体认语言学为观照来阐释“愁”概念隐喻映射“多源性”的发生机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上图所

示(由下而上)，“体认者的认知主体性”和“始源域特征投射的选择性”对“愁”概念隐喻映射“多源性”发生的影响体现出体认语言学“人本观”的解释力，而“始源域特征投射的选择性”和“目标域特征的多样性”的影响则体现了“唯物观”的解释力。具体而言，在隐喻映射的过程中“体认者的认知主体性”发挥了先导性作用，因为体验毕竟是人的体验，“体验是建构意义的来源和基础”(魏在江,2016:360)，“作为意义建构的主体，人必然将自身反射到意义之上”(黄蓓等,2012:4)。虽然面对同一目标概念“愁”，不同的认知主体会根据自身特有的体验而选择不同的始源参照来进行隐喻投射，如杜甫选择“江草”，李清照选择“落花”，王雱选择“烟缕”，这便造成隐喻映射“多源性”的发生。与此同时，“始源域特征投射的选择性”和“目标域特征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隐喻映射“多源性”的产生，因为体认既彰显“人本”，也强调“唯物”。如在李煜的隐喻表达中，目标概念的“愁”既可以是“错乱”也可以是“无穷尽”，因此，可以由如“丝麻”和“春水”等多个始源域进行映射，这体现了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观”。“丝麻”兼有“细小”与“错乱”，“春水”兼有“晶莹”与“无穷尽”等特征，这又需要进一步的特征“抑制”与“聚焦”(如抑制了“细小”和“晶莹”，聚焦于“错乱”和“无穷尽”)，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人本观”体现。可以说，“特征聚焦”是体认者进行主客互动、实现始源域向目标域投射的重要环节，唯有“特征聚焦”恰当，隐喻映射才能恰如其分，最后才能建构起“愁是丝麻”“愁是春水”等形象的概念隐喻。概言之，“体认者的认知主体性”“始源域特征投射的选择性”以及“目标域特征的多样性”共同促进相应概念隐喻映射“多源性”的发生。

## 5 结语

王寅(2019:21)认为“语言具有体认性。”作为人类重要的认知方式，隐喻表达也具有体认性。在体认语言学的观照下，本文系统分析了隐喻映射“多源性”的发生理据。研究表明，任何隐喻的产生都隐含着体认者对某一特定事物的独特体验，表现出其对特定事物的特殊认知心路历程。隐喻映射是一个特征选择与聚焦的认知过程。每一次映射的发生，始源域和目标域都只强调其某一方面的特征，同时抑制了其他方面的特征。一个目标概念选择什么样的始源域来进行映射，一方面取决于隐喻构建者所希望聚焦的角度(体认“人本观”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该始源域是否具有相应的典型特征(体认“唯物观”的体现)。概言之，“体认者的认知主体性”“始源域特征投射的选择性”以及“目标域特征的多样性”共同决定了相应概念隐喻映射的“多源性”。正是由于隐喻映射具有“多源性”，人类的语言表达才会如此五彩缤纷，绚丽多姿。

### 参考文献:

- Janzen, Terry. 2004. Space Rotation, Perspective Shift, and Verb Morphology in ASL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5): 149-174.
- Kövecses, Zoltán. 2002/2010.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övecses, Zoltán. 2017. Levels of Metaphor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 321-347.
- Kövecses, Zoltán. 2020. *Extended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 黄蓓, 文旭. 2012. 意义的心智之维——作为表征主观性的意义 [J]. *外语学刊* (2): 1-5.
- 刘玉梅, 王娟, 井自纯. 2020. 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之路——首届体认语言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J]. *外国语文* (3):

158-160.

- 刘云飞. 2019. 体认语言学视角下致使类兼语构式的概念套叠研究[J]. 外国语文(5):15-21.
- 刘正光. 2003. 隐喻映射的本质特征[J]. 外语学刊(3): 8-13.
- 牛保义. 2021. 试析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1): 26-35.
- 钱钟书. 1986. 管锥编:第1卷[M]. 上海: 中华书局.
- 束定芳. 2016. “境界”与“概念化”——王国维的诗歌理论与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化”理论[J]. 外语教学(4):1-6.
- 覃修桂, 黄兴运. 2014. 概念隐喻中始源域“多元性”的体验哲学观——以汉语诗词中“愁”的概念隐喻为例[J]. 外语与外语教学(5):24-29.
- 帖伊, 覃修桂. 2019. 体认语言学视角下的名词谓语句研究: 构式界定与认知动因[J]. 外国语文(5):22-29.
- 王文斌, 林波. 2003. 论隐喻中的始源之源[J]. 外语研究(4): 9-12.
- 王文斌. 2007a. 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文斌. 2007b. 论隐喻构建的主体自洽[J]. 外语教学(1): 5-10.
- 王寅, 王天翼. 2019. 基于体认语言学的英语语法教学[J]. 外语界(1):44-52.
- 王寅. 2014.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J]. 外国语文(6):61-67.
- 王寅. 2017. 哲学与语言学互为摇篮[J]. 外语学刊(2):1-6.
- 王寅. 2019. 体认语言学发凡[J]. 中国外语(6):19-25.
- 王寅. 2020. 体认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寅. 2021. 体认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以体认参照点为例[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3):3-15.
- 魏在江. 2016. 概念转喻的体验哲学观[J]. 现代外语(3):358-368.
- 徐盛桓. 2014. 隐喻的起因、发生和建构[J]. 外语教学与研究(3):364-374.
- 张克定. 2019. 体认原则及体认者、现实和语言的相互关系[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6):71-80.
- 赵永峰. 2019. 身体·体验·认知: 语言主体间性建构研究——以英语人称代词为例[J]. 外国语文(5):8-14.

## The Multi-Source Domain of Metaph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HUANG Xingyun XIE Shijian

**Abstract:** Originated from the language localization theory,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furthers a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reating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otivation of the multi-source domain of metaphor mapping from three dimensions, with the concept of “sorrow” as an example. It is found that metaphor is a kind of mental mapping of the addressees, reflecting their embodiment and cognition of the target. The metaphor mapping is the possession of the addressees’ feature highlighting as well as feature controlling between the source domain and target domai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t is the diversity of the cognitive subjects, the selectivity of the source domain feature in mapping as well as the multi-feature of the target concepts that co-determine the nature of the multi-source domain of metaphor mapping.

**Key words:**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cognitive subjectivity; metaphor mapping; multi-source domain

责任编辑: 蒋勇军